

论《窦娥冤》中对所谓“传统妇德”的态度

彭璐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云南省昆明市，650504；

摘要：本文以《窦娥冤》中所提及的“传统妇德”为核心，探寻了“妇德”观念的历史缘由和各朝代发展情况，从女主人公窦娥和作者关汉卿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他们对这一观念的看法和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因素，结合元代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底层妇女与落魄文人的心态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和行

关键词：窦娥冤；妇德；悲剧性；元代社会风气

DOI：10.69979/3041-0673.24.7.043

所谓“妇德”，是指妇女贞顺的道德，后来也指对妇女道德、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中国古代的妇德文化发轫已久，源远流长。《礼记·昏义》中记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注：“妇德，贞顺也。”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奉为经典，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学习文化内容。经戴圣编撰，郑玄作注后，《礼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当时传统社会女子无形的枷锁和为数不多却必不可少要接受的教育内容。《礼记·服丧》中记述了需要女子一生践行的“三从”规范，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记述了一个合格的女子应当时刻注重的“四德”原则，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甚至可以粗略的认为儒家传统妇德思想的主干与精髓在《礼记》中已经基本具备，后世妇德著作实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反复阐释、演绎、细化和延伸，对女子的规训内涵虽然随朝代和统治者政策的不同而时宽时严，但整体看来是压迫愈演愈烈，思想禁锢越来越深，女子自由生活的牵绊逐步沉重。

西汉时期刘向的《列女传》和东汉班昭所作《女戒》也是传统时代妇德教育宣传的标志性和奠基性著作。到了汉末魏晋六朝时期，虽处于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确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期，是最富于智慧、最热情浓郁的时代。由于受社会大背景的影响，汉代确立的儒家妇德观念在此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但这一时期仍旧有不少关于规训妇女的作品流传后世，如诸葛亮

上层社会的女性视角对下层女性提出更加严苛刁钻的要求，将中国妇德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阶段。北宋之后，不断加强的皇权统治和走向僵化的理学思想使得社会对妇女的控制欲也日益增强，理学家们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对女性提出更加细化的行为准则，严酷的妇德规范压缩了当时女性本就不够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断崖式急剧下降的状态，妇德教育呈现出普及化、全面化的趋势和现象。直到《窦娥冤》成书的元朝，民族融合、文化冲突显得更加尖锐，空前激烈，妇德观念明显受到儒家文化和蒙古民族自由风尚的影响而变得相对宽松。与宋代相比，元代前期女性享有较多的权利，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随着中原文化观念与理学作用对蒙古掌权者的影响日趋加深，上位者开始接受这一套素来在中原得以留存的文化内容并用于治理社会的规则制定中，使得元代中后期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下文将结合《窦娥冤》文本内容，从女主人公窦娥和作者关汉卿两个不同的角度分别论述其对所谓“传统妇德”的态度。

笔者认为窦娥对于“传统妇德”的态度应当处于中立地位，她并非是发自内心认可传统礼教下的对妇女的规训要求，但迫于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不得不做出遵循甚至是维护所谓“传统妇德”的行为。

这些情况首先体现在妇德是元代女性教育的首要内容，“家之兴废，往往系于女德之何如”，“家之和与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元代社会把妇德提升到一个看似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把它作为家庭和睦兴旺的标志，信奉为女子道德良善评判体系下最为要紧的条例，实则是美化了对女性变相性的苛刻要求，为家庭兴衰找到了不怪罪于男性骄奢淫逸、贪腐懒惰行为的“替罪羊”。在开篇窦娥的念白中道“妾身窦娥，小字端云，祖居楚州人氏。我三岁以上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

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也二十岁也。”可见窦娥幼年丧母，又离开父亲在蔡婆婆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童养媳生活，成亲不久夫君过世，按照所谓“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的观念来看，窦娥自小没有父亲庇护，成婚后丈夫早逝也未有一儿半女可以依靠傍身，她与蔡婆婆相依为命，靠着婆家放高利贷的营生手段面前过火，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让她始终处于一个青黄不接、尴尬不已的中间地位。这样一位在生命形式上失去了当时社会认定下可以依靠的三位男性，窦娥难以继续按照古代传统妇德标准孝顺父亲，服侍丈夫，养育子孙，她作为女性角色失去了时代生活赋予她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上长期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为了不成为街坊邻里所诟病所嘲讽的对象让夫家蒙羞，让父亲受辱，窦娥只能比别人更加按照传统妇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把自己驯化成传统礼教虔诚的信徒，但实际上这只是她寻求安全感、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以同化麻木自己的一种手段。

其次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妇德观念里，“贞洁”是对女子的首要要求，“女以贞洁为守，宁死义，不可辱”。所谓贞洁烈女最极端的行为就是主动牺牲生命以示自己“从一而终”的决心，这就使得窦娥这一角色并无丝毫嫁给张驴儿的可能，也加剧了窦娥身上或遵循或反抗传统妇德之间的矛盾。她一面不能彻底与传统压迫做出决裂，一面又不得不严格遵循所谓的礼教束缚，这使得窦娥这一形象更加生动丰满也更具悲剧色彩。

再次体现在窦娥刚到蔡婆婆家里时，蔡婆婆说：“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可见蔡婆婆为人并不苛刻，在缺少父亲关爱的童年生活里也给予了窦娥一隅避风港，她养育窦娥长大成人，也许在窦娥的潜意识里也能够把蔡婆婆当成亲人一般看待。既如此窦娥反哺孝顺婆婆的行为就不能片面的认为是出于她被传统妇德压迫下的无奈选择，只能证明窦娥骨子里是个良善贤淑的人。基于元代的社会背景和窦娥所接受的教育来看，并不能认为她是一个尊崇“妇德”的角色，相反，她是一个坚毅而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在即将行走刑之前，窦娥有如下唱段：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短命，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她大胆斥责天地鬼神，慨叹命运不公，良善之人未能得到善终的结局，奸邪之人反倒能够稳坐高台，倘若是十足维护尊崇传统妇德的女性又怎会发出这样的呐喊？怎会在慷慨赴死前声讨天堂地府这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人死后的归宿不辨忠奸？一位素来遵从礼教的柔弱女子怎会突然当众爆发出说出这许多“大逆不道”的狂悖之言？尽管窦娥的反抗更多是出于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和对于无所作为的地方官员桎梏和阴险狡诈的张驴儿的厌恶与愤怒，在其中昭示着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其呈现出来的绝非是发自内心的对“传统妇德”的维护，所以笔者认为窦娥是迫于客观现实原因选择遵从妇德而不是出于主观能动支持拥护传统妇德。

《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也并非“传统妇德”的倡导者，只是出于特定的社会话语体系下对传统妇德的默认。元朝时期蒙古人入主中原，汉人的政治地位以及流传已久的儒家文化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据《国史大纲》所记载：“汉人、南人不为正官。”在担任职务上对汉人进行限制的同时，选举官员的方式也有失公允，“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榜考试。”“左榜为汉人、南人，其真才实学多不屑应举。”统治者轻视科举、不任用汉人贤才的行为使得许多士人失去了通过科考跻身仕途的路径，元代士人群体被列为“九儒十丐”之流，社会地位甚至排在娼妓之后，这才使得以关汉卿为首的“书会才人”这一文人团体得以发展壮大。

关汉卿在如此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将自己仕途无望的愤懑和哀伤之情投注笔端，壮志难酬的失落感使得以关汉卿为代表的许多元代文人将视野转向同样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他们与窦娥一样饱受时代压迫与不公，被皇权鄙弃，被父权排挤，剧作家与这些社会上境遇凄苦的女性人物角色更能产生情感共鸣。尽管面对科举选士制度名存实亡的社会现状，关汉卿流连娱乐场所创作戏剧，但他的“学而优则仕”的心态始终不会随时代改变，他心中仍然存在着对于上位统治者的希望，希望能够有机会走上仕途得以重用进而实现报效国家的人生理想。所以他在作品中对统治者始终保持着敬畏的态度，进而造成了他在书写窦娥命运抉择前理所当然的让其遵守妇德牺牲自我。他的作品体现着对黑暗社会和腐朽政治的反抗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始终只是凝聚在具体的个人或小团体式的黑恶势力或者某个办事官员身上，仅停留在表面问题而未有进一步深刻的反思与探究，对于一切压迫的源头——掌权者不曾实行仁政体察民情，关心爱护下层劳苦大众这一事实并未表现出任何批判的意味。《窦娥冤》以“秉鉴持衡廉访使”作为题目，窦娥死后得以沉冤昭雪离不开身为朝廷

要员的父亲窦天章。窦天章出场时说到：“老夫自到京师，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节操坚刚，谢圣恩可怜。”作者在肯定窦天章个人品行能力出众的同时不忘感谢圣恩，可以看出关汉卿对于最高统治阶级的依旧持有肯定态度，这也使得窦娥虽然有反抗的行为但免不了要走向死亡的必然悲剧。加之男性作家习惯以男权中心思想作为出发点去塑造他们所谓正统的女性形象，“三从四德”的妇女从来都是效忠父权和夫权的工具和牺牲品，她们的存在为处于社会主体的男性提供了无论生活实质上或是精神内涵上的话语权，让尽管是作为劳苦大众的男性能获得短暂的上位者的身份，他们并未看到女性的真正困境，也并非是想为历来受到伤害处于若是地位的女性发声呐喊，关汉卿只是需要一个媒介以表达自己心中的怨怼与长久的希冀，故而借窦娥的所作所为来重申忠孝节义的社会观念，表达自己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可以及对传统权力核心的追随。所以笔者认为关汉卿本人对“传统妇德”并不反对，他只是借“传统妇德”的名义维护儒家传统思想和社会纲常伦理，以期维护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和原本应该获得的入仕为臣效忠君主的机会。

综上，基于对妇德文化发展历程探索和相关重要作品的成列，笔者认为窦娥是被迫遵循“传统妇德”这一观念的物

化载体，但对这种思想是无意识所谓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只是她获得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窦娥的悲剧结局使之逐渐成为“传统妇德”文化背景下作为教育典范的人物形象被后世流传，这一文化也成为她在当时社会勉强过活加以傍身的借口，但不可否认她身上的反抗精神也会成为当时深受压迫的妇女们所乐见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让下层群众看见斗争胜利的希望；而关汉卿对于“传统妇德”的态度是并非完全反对的，他所提倡的是“传统妇德”背后依托的儒家文化，希望以剧作话本的形式弘扬儒家文化，真正让上层掌权者看到这一文化能够被用于社会政策中的内容，为儒家学子争取到更为宽阔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 [1] 关汉卿. 关汉卿选集[M] 康保成李树玲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06
 - [2] 张静. 元代妇德教育暨事迹考述[J]. 兰台世界 2011. 10 下旬刊
 - [3] 杨茜. 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C]. 西部学刊 2018 年第 1 期
- 作者简介：彭璐（2004.12），女，汉族，云南曲靖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